塑造新时代乡村典型人物

徐 刚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典型人物，他们之所以重要，在于能够凝聚起时代的总体性要求，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一些人物甚至成为时代的偶像和象征，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审美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典型人物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于今日中国而言，新的经验正在孕育新的现实，而生生不息的“现实”，又为新时代之文学注入无限的活力与可能，所有这些，都亟待作家们通过塑造新的时代典型去积极捕捉和挖掘。

事实上，在近年来的乡村题材小说中，这种新时代的“活力与可能”，也正在通过新的典型人物的书写和塑造不断展现。从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到赵德发的《经山海》，从付秀莹的《野望》再到乔叶的《宝水》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当下新农村建设这一如火如荼的新现实，而小说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严肃思考，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文学传统的当代再现。

当然，新时代的新故事或新内容，一方面固然需要有新的写作者来深入表现，同时也迫切需要我们今天的作家去重新理解现实。“深入生活”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写作伦理。从这些年来文学与生活的表现关系来看，大致有这么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从文学的公共生活到一种私人生活，再到个体化的极致。这种灵魂深度的探寻固然重要，但刻意地强调也会带来问题：它容易演变为孤独、绝望、颓丧和虚无等情绪的堆积。如何从这种狭窄的个人情感中突围而出，寻找更为开阔的社会情感，这想必正是新时代典型人物塑造所面临的关键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所寄予的时代内涵。小说的女主人公吴小蒿这个乡镇干部形象，堪称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当然，她从普通人中走来，当她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勇敢走出，将身心重新安顿到集体事业中时，一个新的自我便诞生了，寄寓在她身上的时代意识也顺势凸显了出来。吴小蒿身上镌刻的新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于，她能够让人看到青年的“破茧成蝶”，将个人的事业与更多人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然而，《经山海》的结尾引出一个问题：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塑造如何体现真实感与可信度？我们的文艺创作常常会依据惯性思维，让那些时代人物完美得不太真实。

在此，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或许能给我们提供若干启示。同样是塑造基层好干部的典型人物形象，电视剧里黄轩扮演的马得福就与习惯意义上的形象有所不同。他当然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但不可否认，他也包含着更加明显的功利性。电视剧一方面非常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因为人终究是会变化的，热情会消退，这都是非常现实的；而另一方面其实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理念：好干部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认真培养的，这里包含着一个漫长的过程，英雄也好，楷模也罢，都是需要不断敲打、锤炼，乃至久经考验的。在马得福消沉、茫然、退却，甚至开始游走在腐败边缘的时候，这里有他父亲的“敲打”，还有老领导张树成的及时指导和教育，这对于迷茫中的马得福都是极有意义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山海情》生动体现了典型人物塑造过程中的真实感与可信度。

作为一部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的另一处具有启示意义的地方在于人物群像的设置，它极大程度地避免了单一楷模人物在叙事上的单调，以时代楷模的群像方式传递一种更为辽阔厚重、更加丰富立体的精神力量。

这种人物塑造方面的启示意义，在乔叶最近的长篇小说《宝水》中也有鲜明的呈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借“我”之眼见证的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这就不得不提到宝水村关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设计师、人称“孟胡子”的孟载这个人物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人物。他并非基层党政干部，也不是资本操盘手或土地开发商，却人脉广泛，有能力四处协调，引来各路资本。表面看去，这是因项目而来“利来而聚，利去而散”的金钱关系，但他显然并非逐利之徒。小说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孟胡子对事业的全情投入，尽管他的敬业与专业或许只是基于契约而来的某种岗位意识，但他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的热情态势，终究让人联想起过往文学中的诸多典型人物。小说极为生动地强调了他的智慧与经验，凸显了他对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独特看法，以及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中所涉及的对于乡村人情事理的透彻理解。

小说最后，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新型农民正在崛起，在乡村将来的更大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小曹和青蓝等更多的年轻人，也将与“我”一道扎根农村、建设家乡，努力实践当年《朝阳沟》所热情呼唤的关于“农业科学家”，以及新时代“知识农民”的伟大梦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的“美丽乡村”，为未来的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入生活描绘乡土

杨占平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他去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西戎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

繁忙的工作之余，西戎仍然挤出时间写作，创作出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他把这些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经组织协调，1952年11月，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他在《文学路上五十春》一文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晚开群众大会宣讲总路线。干部会、党团员会经常不断，研究扩社、并社、转社、土地入股、牲畜作价，事无巨细，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得干什么。因为群众听说我是作家，制定村民公约、起草转高级社的章程，都要我来起草。我的住处就在农业社办公的天龙庙里，整天房里人来人往，不是来谈公事，就是来说家事，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有时为了调解一件家庭纠纷，闹得我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每天挨门吃派饭，这也是接近群众、了解民情最好的途径。每到一家，边吃边聊，可以听到会议上听不到的意见，也可以知道村里许多的轶闻趣事。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从早忙到晚，我仿佛忘了疲劳，天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农村生活是那样地丰富多彩，人是那样地百人百性，看到学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对我这个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来说，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我十分庆幸能获得这样一次兼职深入生活的机会，心中已不再为缺乏生活素材而焦虑不安。回到北京以后，接连写出了六个短篇，都比较成功。

西戎所说的六个成功的短篇，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新中国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着力于塑造具有高度个性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刻意创造浓郁的乡土情调，注重生动的细节描写，使用质朴的文学语言，强调充满情趣的喜剧效果。

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儿弟兄的故事，于是两次到唐兴庄蒋家与英雄的母亲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迹。他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并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来汾阳与西戎汇合。两人再度合作，进一步采访了有关人员，讨论写作提纲，设计故事情节，然后分头写作。不久，创作出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公映后，观众热烈欢迎，该片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一年以后，两人对剧本作了较大修改、加工，以文学剧本的形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通过这次在汾阳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有距离。1955年，他调回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他投入了很大心血，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西戎很少正面写重大题材和重要人物，总是选择普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进行描写，收到以小寓大和小中见大的效果。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从来没有大而空的影子，从来没有概念化的痕迹，即使是一个着墨很少的人物，往往也是活脱脱的。这些人物都像西戎本人一样质朴、真诚而直率，他们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他们不唱高调、不赶浪头、不追时髦；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和虚情假意；他们也不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他们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真真切切、平平常常、实实在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人物才能够成为艺术典型。虽然，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戎的这些作品留下了农村合作化、公社化的痕迹；当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再回头去审视那段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来。但是，由于作品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本来面目，特别是塑造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特点的人物，就不显得不真实；相反，倒是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来。

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央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喜爱，也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

②

差异化表达对生活的思考

——《萨赫勒荒原》的艺术张力

张燕玲

朱山坡虚心问学求变，不懈地探索创作的差异性，寻求在地方性和世界性的融会中，建构自己的小说样貌和美学个性。

朱山坡一路走来，像野草一样向上生长，到短篇小说集《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就成长为一棵“大树”了。一样的题材独特，一样的天马行空，但他在叙事上变得淡定从容，或者说静水深流却暗流涌动，感情丰沛，精神高远，尤其是思想深挚。讲故事更有思考性，所有人物、所有故事，朝着他既定的那个思想前进，层层深入、步步推进，节制内敛又勇往直前。

小说集《萨赫勒荒原》收入朱山坡9篇短篇小说，他一如既往深入人物灵魂，为我们讲述9个富有“差异性”的故事，不少故事多了国际视野的异域题材。其中的小说《萨赫勒荒原》以大爱慈悲之心，讲述了中国援非医生在尼日尔与当地百姓生死相交的深沉故事，题材独特，叙述从容，情感丰沛，笔致深沉，尤其寥寥数笔即生动勾勒出萨哈及其母亲、儿子的精神形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艺术表达。

作品中的大多数故事不断用一些世界标志性的意象，来辅助他对人物灵魂的挖掘与表现，如非洲荒原的《萨赫勒荒原》，骑着骆驼的“母亲”为37个索马里部落放映过电影的《索马里骆驼》，热情率真的《卢旺达女诗人》等。

我认为书中的《夜泳失踪者》，是完成度最好的一篇。它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气质，沉潜从容、透彻精准，还富有诗性和巨大的艺术张力，洞察所有的人物和人生。疲于俗世的夜泳四君子，如何在星光灿烂的一条美丽河流里自我治愈？“在夜泳中，我们很少说话，尤其忌谈工作和是非。”樊湘叮嘱过，除非喊救命，否则请勿交谈。因为夜泳“是一个人远离尘世纷扰、排除内心杂念、安静地享受孤独的过程，是思考人生的过程，是体验江河浩荡、夜空浩渺的过程，是与黑夜无声对话的过程”。于是“夜泳时，繁星低垂窃语，江水轻拍吾身，隔绝两岸喧嚣，独自挥臂前行”，情景交融，夜晚如此的岁月静好，互照的是四人日常的不如意。所有的情、景、物、人都活在生动的细节里，人物灵魂的挖掘尤其拿捏得恰到好处。

朱山坡一直是位擅长写人物的高手，对每个人物的把握进退有度、准确动人。樊馆长、老贺、老潘、市长，特别是传说在江里消失的谢布衣，是人物，是人生，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此，朱山坡先是撒野般地信马由缰，写出每个人物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灵魂，同时，作者又适时以“我”的视角去一一观照这些人物，“我”是这些灵魂的穿针者，是那根线，牵引出所有人物如何从此岸的精神荒原夜渡到彼岸，如何自我救赎，使作品孕育出思想的丰富性和艺术的张力。朱山坡刻画出了他们每个人的灵魂，可敬可怜，无奈无常，既平实沉静又惊心动魄，既精准到位又栩栩如生，既才情丰沛又内敛节制，完成度很高。于是，小说具有一股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魅力。

朱山坡说他要“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也就是从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融会中寻找自己的文学个性。在我的心目中，文化的差异性只要与人类文明融会，就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换一种方法讲“中国制造”

——《大博弈》创作谈

周梅森

电视剧《大博弈》改编自我的同名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讲述了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奋进和崛起的故事。中国制造的一步步崛起影响了世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作为见证者和受益者，我很想直面中国制造走过的艰巨、复杂又悲壮的道路，写出其中的人和事，给中国民族工业复兴的历史留下一块文学和影视的记忆。但是，我想换一种方法来讲“中国制造”的故事。

人物转型升级

《大博弈》的创意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那是个令人难忘的时期，改革开放加速，资本市场雄起。一家著名重装动力集团公司老总见到我，和我说起了他的故事。嗣后我跟踪了他许多年，几次到他旗下的企业采访，体验生活，受益匪浅。我这才发现，决定企业命运的是一大批像《大博弈》中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是他们带领企业走出了困境，创造出一个个产业奇迹。于是，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故事开始在我脑海里酝酿，12年后变成了这部《大博弈》。

关于“中国制造”题材，很多影视剧表现过，也都不错，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自己的作家，当然更不会重复他人的模式。我想尝试一种新的表现工业和改革题材的艺术形式，首要一个就是不走技术派路线，不走悲情路线。就工业谈工业，我称之为技术派，这些讲一厂、一地、一市产品创新、改造升级，工人无私奉献，是最常见的小叙事角度。而《大博弈》讲的是中国制造在什么基础上、怎么崛起的，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企业家和制造业的故事，又是一个关于资本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作品通常规模很大，人物关系复杂，这是我的一贯风格。我喜欢纵横捭阖的感觉，喜欢人物在大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荡气回肠的命运大剧。再伟大的理想、再大的舞台，都是人在表演，所以，我努力写出每个人物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比如《大博弈》中的孙和平，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他几度寻求跑路不愿担任厂长，勉强出任后又卑微地四处找其他企业“讨饭”寻找资金，创业经历“不正经”，博弈过程不按常理，但最终逆袭成功，算得上我笔下男主人公的一次转型升级。《大博弈》中的主人公们，只要奋斗过，没有失败者，失败了，他们也是英雄。“中国制造”正是有许许多多孙和平这样的企业家出智出力，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直面时代大潮

我最初创作的小说，如《沉沦的土地》《大捷》《冷血》《军歌》等，光看名字就充满冷硬风格，那是很纯很纯的“纯文学”。那时候，我喜欢研究历史，因为那时还没有过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像《人民的名义》这种作品是写不了的，就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素材和灵感，去翻新那些“历史的尘埃掩盖下的故事和人性”。1997年，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当代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其后仿佛是掘开了一口富产的油井，不可遏止地喷发出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

电视剧《大博弈》海报

从新历史小说大踏步转向现实主义，是因为我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充满了深刻的矛盾，一名作家应该尽其所能去记录国家与民族艰难的崛起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但中国确确实实在进步。我所有作品的立足点就在这里，在对改革开放充分肯定的基础上谈问题，力求写透中国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

我的创作来源于我丰富的人生经历，来源于我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了解。我14岁进煤矿，每天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在300米深的井下运煤，头顶一层层花岗岩、页岩、火成岩。正是因为这种低基础的生活开端，文学的转换也就自然而然，追着我的生活跑，生活不停下来，我的创作就不会枯竭。

我希望年轻人来看我的剧，读我的小说，我讲的故事他们或许没经历过，我描述的那个年代或许他们还没出生，但是，英雄主义、与命运拼搏的斗志、永不言败的进取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需要的，都是年轻人应该具有的底色和亮色。

阅读经典 汲取养分

袁 欢

作家谈论阅读往往具备独特的吸引力。他们带领读者进入某本书的路径绝不是“方法论“式的，常常只是朴素地陈述自己作为读者的切身感受，却因为对阅读的热爱自然而然生发的感染力，触动人心。

余华谈到好书与读者的相遇是需要时间的。“阅读让我知道我的内心还是很宽广的，因为我可以接纳各种各样的我所没有经历过的经历，我所没有产生过的情感。前提是，这本书跟你相遇。”在余华看来，直到35岁，他才真正与鲁迅相遇。35岁之前，他没有认真读过鲁迅，鲁迅对他而言只是远处一个伟大的存在。35岁那年，他打开了《狂人日记》，第一段中，鲁迅用一句话勾勒出狂人整个的精神状态，余华直呼：“太牛了！”

一些年轻人爱看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直言喜欢读这些作品并不觉得羞耻，但也知道阅读受限可能会让自己成长的厚度因此变窄。苏童表示：“阅读，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任何羞耻感。”他作了有趣的类比，不同的阅读给予人不同的养分，苏童比之为鱼肉和猪肉之差，猪肉吃多了，偶尔来点经典文学当作“鱼肉”，也是很好的。对当代年轻人阅读的状态与取向，他尊重和认可，也引出自己的观点：鼓励阅读经典。“好比读琼瑶等言情小说，可能召唤人往前走5米，但如果读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读者可能会前进50米，甚至更多。”“经典作品的光辉，不会经岁月磨灭，只会随着时间焕发出更大的光芒。”他现在才读懂《白鲸》，“你能拒绝经典一次，不能拒绝它第二次”。

西川讲述自己的阅读经历：“别人说你读懂了，你打开了，而我最早是由一些不懂的东西打开的。”读不懂的书，反而激发他对文化的好奇。“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限的，阅读使你跨越这些你看不见的边界，进入到另一个对话范围中。”

图片来源：百度